

“整本书阅读”之我见③

可替代的一架书 不如 不能被替代的一本书

□彭玉平

王闿运抄书成癖，今覆检其多种著述，其最初一念之文思，即多从抄书中获得。后来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抄书是最好的读书方法》，他说：“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，抄书便是提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的方法。”

当下学术体制已经进入短平快的时代，诸多著名的量化考核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、钝化了对学术的神圣感和敬畏感，原本应是九分读书一分作文，现在大概是三分读书七分作文，甚者写的文字超过读书的文字，若论读书研究之荒唐，大概莫此为甚了。这应该是泡沫学术大量产生的现实背景。

从著书立说的角度而言，我始终认为可以被替代的一架书，不如不能被替代的一本书。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再主张抄书了，但如果是生命中至要之书，若真能潜心抄写一过，相信所得比浏览一过要更多，也许更深。盖一字一句下过功夫的著作，不单单能悟得其连贯之思，即其中关键问题，也多独特之体会。所以，一流的学者，在一流天赋之外，也一定具有过人的勤奋。

六月再检《湘绮楼日记》，因知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古典学者，基本功大体建立在三者之上：一曰抄书；二曰点读；三曰含玩经典论著。如此，勤勉之功方得彰显，而路头亦正，得学者之光明。而衡量一个古典学者之学术格局亦有三者：一曰抄书；二曰选本；三曰著述。盖注疏一种书，不需要精读，用力自深，抑且留住自家田地。当然所选之书，应具有经典意味，此正如朱熹所说：“天下更有大江大河，不可守个土窟子，谓水专在是。”所注之书，若果然具有大江大河的品质，则境界自然因此大开；编一种选本，乃明一种文体源流，可见史家眼光与通观精神；著书立说，则见裁断之力与学术之格局。今日论家多忽视前二者，倾力于专著；而文献学家复偏嗜前两者，难见整体之文思，故学术或欠实学底蕴，或乏凌空之思。今再三思湘绮翁之论，其真乃善学善思者也。

为什么“学者如牛毛，而成者如麟角”？除了天赋有高低，主要原因就是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不同而造成的。而读《越缙堂日记》《湘绮楼日记》可知，学术尚须多交流切磋。王阳明心学光耀士林，其深所悟得者亦有部分在此，盖一人之思想终究格局有限也。方今之世，杜门读书者少，然如沙龙、论坛、学术会议之类，固多学人行迹之交集，却往往各云其思，各说各话，鲜有切实之学术对话，几成学人之交友会，若云交流切磋之大益，不可得也。

回思明清学术，何以能得学术之大江大河，盖亦足有深思者在焉。若果真有昌明真学术之心，或许未可一味奔竞于前，若路头一差，则可误入旁门左道，绝尘而去，不复归根矣。若王闿运之抄书、点读、注书、选本、著述，循序渐进，步履稳健，日有进益，方能庶几乎有成。

回顾学术，我们不仅可在丰厚的学术史上采撷果实，也可总结其读书治学之良方，古为今用，既葆传统之辉光，复成今日之学术，则何其幸也。吾师王运通先生曾说：“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情。”学术如果回到“老实”的本来轨道，则一定前景可期。

岁月无情又有情，从来不败读书人。这是我以前写下的文字，不妨在这里重复一遍，与诸君共勉：在天地之间，青灯对黄卷，做个安静的读书人。



黄灯

最近，任教于广东某二本高校的黄灯出版了新书《我的二本学生》，该书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数量庞大而又被忽视的群体——“二本学生”，由此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：二本学生们如何生存？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？这个特殊群体透视出怎样的大学教育现状？日前，黄灯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——

“二本学生”：要成为更好的人 而不是就业工具

□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

用非虚构手法呈现二本学生生存现状

羊城晚报：您为什么想到要以自己教过的二本学生为题材创作《我的二本学生》这样一部作品？

黄灯：我不是专业作家，不存在为了写作刻意去找题材；自己本职工作就是老师，也是因为教了十几年书以后有一些感性的认识，就觉得有些话想说。而且在公共领域里面也很难听到这种声音，就出现这样的创作想法，会有意识地在平时去积累一些材料，跟学生深入交流，有意识地做一些田野调查。

羊城晚报：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，然后开始着手调查的？

黄灯：我跟学生交往一直有个习惯，我会尽可能把他们的东西留下来，包括短信、邮件、作业，平时我都会做个有心人。但那时候并不是出于写作的目的，纯粹就是觉得不存下来挺可惜的，比如说学生做的作业、写的作文，我都很舍不得丢。那个时候都是手写稿，所以我特别珍惜那些东西，我会放在抽屉里面，放在我的文件柜里面，锁起来，搬家都保存得很好。

真正想到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应该是四五年以前，那个时候

就想到要下意识多收集一些材料。其实我想写的几个群体，有农民群体、工人群体，还有学生群体，都是我很熟悉的。最想写的就是学生群体，因为确实觉得好多东西都值得写。然后，有出版社约稿，就决定写一本书看看。其实平时对学生的家庭情况也有所了解，当老师的时候就跟他们聊了很多，他们背后的故事已经比较熟悉了。

羊城晚报：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

黄灯：还是有困难的，我在写之前，设想的书跟我现在出

版的书差异还蛮大。因为很多东西我特别想写，但发现真正写的时候好多东西支撑不起来。我特别想写我课堂上的一些情况，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是我特别重视的，我想把课堂还原。但现在离开了课堂，很难找到现场感了，然后教的学生又太多，很难聚焦起来，其实那个是我非常想写的一节。还有公开课也是，我想非常具体地讨论怎么上课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。最后出来的作品也不是说特别不满意，因为我最想表达的观点还是表达出来了。

羊城晚报：如果二本学生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
黄灯：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有机会进大学，本身就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，不管是二本院校和一本院校，都是很值得珍惜的。因为现在能够考上二本院校其实也很困难的，所以，二本学生自我认同感要更强一些。到了大学以后，如果是进到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校，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更多的专业精神，应该在专业上对自己有所要求，不要短视，只是盯着一个具体的工作；而把个人的素

养锤炼好，以后就会适应更多的工作岗位。所以，不要太焦虑，举个例子，一个女孩子来到世界上不是为了嫁人，而是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一个更完善的人，我们大学生也是这样，读大学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变成一个就业的工具，而是要成为一个更优秀、更完善、更能够充分发挥自我的人。

现在工作的流动性是非常大的，不要觉得第一份工作的决定性特别大，所以，脚踏实地地从最平凡的工作做起，如果真的有能力，有很好的表达能力、思维能力、处事能力、沟通能力，以及相应的专业技能，这个世界是绝对不会埋没一个真正能干的人的。有时候把身段放低一点，反而有更大的跃升空间。现在的孩子最大的缺点就是从应试教育中走来，不落地，不接地气，如果能够更多地走进生活，走到基层中去，对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是非常有用的。

平衡大学教育中的实用化与精英化

羊城晚报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现在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否使大学教育的目标发生了一些调整？

黄灯：市场化以后，大学教育就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化教育。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还是偏于精英教育，大学招的人比较少，甚至初中到高中录取的都很少。现在大学都扩招了，那社会的整体文化素质会比以前要高。也不能完全说在大众化教育时代，大学教育质量就降低了，比如说有些理科工科，可能质量还是有所提高的，但是人文这一块我觉得确实是没那么重视。比如说历史、哲学、文学，其实是越来越边缘化的。

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专业直接决定以后的就业，比如说学金融的，可能整体的薪酬就要比别的行业高一些，这样就会导致大学教育里面专业越来越跟具体的工作对接。学校希望培养的学生马上能到社会上，能直接上手，马上就可以立足。当然这个目标也没错，本来大众化教育阶段就是把人等同于人力资源，人就是资源。但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人还不完全是资源，就是个大学生的；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那种“天之骄子”的感觉还蛮明显的。

羊城晚报：这对二本大学这类非重点院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？

黄灯：现在一般本科院校，办学确实比较微妙。一方面要培养就业的人才，另一方面在整个学科建设里，又需要做科研。现在纯研究型的大学不难办，因为它的定

位很清晰，学生出来基本上都是继续深造读研读博；职业院校也不纠结，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做实实在在的的事情。但是这种应用型的本科学院就比较纠结，它的定位始终在摇摆。它必须重视学生的就业，不然招生都成问题，但又不能不搞科研，因为整个学校的评价机制在那里，所以它两边都要抓，事实上两边抓起来都没有优势。那些学生又学理论又学实践，学了很多，但学的都是皮毛，付出很多，未必有相应多的收获。

羊城晚报：如何平衡大学教育中的实用化与精英化问题？

黄灯：大众化教育是趋势，它本身就是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。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不好，关键问题是怎么样提高教学质量，怎么样培养的孩子在社会上更容易立足，我觉得现在应该考虑的不是上不上大学的问题，而是怎么样把大学上好。理想化的状态就是，学生不要完全被就业绑架，在大学里有更多的时间让他们成长。整个读大学的过程应该更享受一点，不要完全被找工作或考研压得那么厉害。另一方面，希望大学的人文环境更好一些，人文教育对学生的滋养更多一些，这对年轻人的一生都有好处。不管是什么专业的学生，都需要这种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。现在人文精神的重视和培养确实太匮乏了，有条件有机会应该尽量给那些孩子多一点人文熏陶。

当“二本”遇到“二本”

作者自述

□黄灯

让“大学生”获得更多的精神荣耀

现在回忆起来，我大学时代之所以敢“放肆”，恰恰是因为当年的我足够闲散和放松。同样是“二本”学生，我不用担心找工作（当年大学生还包分配），不用担心生活费（每个月国家有生活补贴），也不用费尽心机地争排名和奖学金（这些因素不会影响学生的前途），更不用为了简历的光鲜去修第二学历、考无数的证；当然，我更加不知“买房”为何物（当初都是单位福利分房）。

我的大学时代，哪怕只是一个中专生、专科生，也被视为“天之骄子”。对农村的孩子而言，考上大学常常被视为

“跳龙门”，并被国家从人事关系上认定为“干部”。当时班上70%的同学来自农村，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，还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，或者在房价低廉时期购买了住房，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，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高性价比。

而对坐在我台下的学生而言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，以及高校并轨的落地，他们面临的真实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。“大学生”这个称号，不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的精神荣耀，他们的前途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尽管获得了更多选择的自由，但也充

满了各种不确定性。

2006年，我当上了062111班的班主任。迎接新生时，我对几个学生和他们的家庭留下了初步的印象。后来我惊讶地发现，我当时的感觉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：一个汕头女孩，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，念书的唯一目标，就是拿到文凭，获得进入社会的人场券。一个惠州男孩，在父母的打点下，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，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。一个孩子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，完全凭个人之力找到了立足之地。

9年后，我接手1516045

班，再一次当上班主任。相比062111班，我能感觉到这一批孩子多了一些不确定的困顿。062111班因为当时良好的就业形势，没有一个学生选择读研，他们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如愿留在了广州、深圳。到1516045班，考研的学生明显增多，不少学生从大二就开始谋划，没有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底气十足地觉得自己能留在广州。毕业季来临的时候，越来越多的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，试图从我的口中，下载一个关于未来的坚定答案；越来越多的学生询问考研的细节、考公务员与创业的胜算……

除了金钱，还有另一种精神诉求

2005年，我博士毕业，进入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。1995年，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，按今天的划分，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。20年前后，我感受到的差异是巨大的。

在我眼中，一个真实的孩子应该特点鲜明，他可能贪吃、调皮、贪玩，但同时应该热情，有好奇心。但从整体而言，我接触到的学生群体，缺点不明显，优点也不明显，他们大多情绪节制，安静持重，好像工厂里生产出来的“标准件”。

有一次上课，我突然头晕，一个女生很熟练地拿出一盒看得见底的虎牌清凉油给我。我疑惑他们为什么会随身携带这种东西。一个男生解释道：老师，我们高三是靠它走过来的。虽然广东F学院是一所二本院校，但考进来的孩子不管出生在城市还是农村，都走过了相似的历程。城里出生的孩子在写给我的作文里说：“高考之前，我记得我整个人生，似乎都在为高考而活。……人生就像一条被预设好的轨迹，我必须不能有一丝差错地照着这个轨迹预演下去，否则，我就会被周围的环境所不容纳。父母的期望，老师的教导，同学之间的攀比，都像一块块巨石，压得我五脏六腑都痛。”

我以为，进入大学之后，孩子们至少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放松，但事实上，他们一进校园，另外一层枷锁就押上来了。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，学校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，增设了很多工具性的课程。尽管我们学院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，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，但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，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、金融类的课程，学生的知识面尽管会由此拓展，但学业压力确实增大很多，在我眼中，学生们有上不完的课，做不完的作业，还有干不完的兼职，他们真的很忙。

我经常和孩子们说，上大学不是为了找工作，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。可是这个模糊的目标看不见，四年后能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却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。“就业”两个字左右着学生的精神状态。很早学校就设有职业规划课，这门课因为“有用”而广受欢迎。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学校开设公开课“大学语文”，经常有学生问我：“老师，你讲的这个到底有什么用？”很多时候，我会觉得尴尬，有时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你们学的专业都是讲怎么赚钱的，而人除了金钱、欲望，还有一种真实的精神诉求，‘大学语文’会让我们更直接感受到人的心灵需求。”



让年轻学生获得真实的力量

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。

我大学毕业并不顺遂。1995年，我被分配至湖南洞庭麻纺织印染厂，先后从事过厂办秘书、会计、团委干事等工作，1997年，国家推行减员增效、下岗分流的政策，我从机关下到车间，成为了一名拥有干部身份的挡车女工，多年的教育仿佛

在23岁那年直接归零，事实上，这段生活给我后来的求学，积蓄了更多的力量。1999

年，我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，之后到中山大学读博士。回顾自己的经历，我发现，求学生活在我的记忆里非常贫乏，所能想起的无非是图书馆、食堂、宿舍“三点一线”，反而是工厂的岁月对我产生了真正的影响，不但让我见识了更多人情冷暖，也认识到了生活更为本质的一面，并由此奠定了我在创作中的底层关注。